中国之治与“东升西降”的文化密码

□ 刘余莉

新论语

●核心观点:在儒家文化中,“志于道”是儒家圣贤君子求学的目的,“得道者多助”是依道而修身、齐家、治国的自然结果,按照“道”处理国际关系形成了“王天下”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教导世人顺道而为,从而真正实现富强、昌达、和平、安乐,这在当今世界依然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余年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着跨越时空价值的儒家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值得认真挖掘和领悟。

在儒家文化中,“志于道”是儒家圣贤君子求学的目的,“得道者多助”是依道而修身、齐家、治国的自然结果,按照“道”处理国际关系形成了“王天下”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教导世人顺道而为,从而真正实现富强、昌达、和平、安乐,这在当今世界依然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志于道”:

儒家君子圣贤学问的旨归

在儒家经典中,“道”指宇宙万有的本体,有时也指回归本体的途径、道路、方法和规律。孔子说:“志于道。”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唯有顺应“道”来修身治国,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否则必然败亡。

《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顺着人人具有的本性而为就是“道”,能够把本有的天性彰显出来的得道之人就是圣人。“道”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无所不在,因而得道之人具备无所不知的特点。圣人顺应天道的特点治理天下,如《群书治要·袁子正书》讲:“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为尊,不敢恃其强,以法为强。亲道不亲人,故天下皆亲也。爱义不爱近,故万里为近也。天下同道,万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国治国,以天下治天下,圣王之道也。”

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人都具有成圣成贤的潜质,通过学道都可以回归本性、成为圣贤,因此“无所不知”并非平常人不可企及的目标。“为道”要达到“无所不知”,必须修清净心,孔子教人“六艺”,乃至后代的琴棋书画等,都是修清净心的方法。

对于学习从政的士大夫而言,读书办政治的过程同样是求道、成圣成贤的过程。因此,其所读之书应是通达本性之书,读书的方法和目的与单纯的求知识不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因为通过读书把清净心开发出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才能够达到“明明德”的目的;士大夫通过办政治无私为大众服务,是一种开启自性明德的途径,再通过“亲民”帮助民众开启明德,并使二者都达到至善圆满的境界。这样,士大夫从政的过程就成为一个求道、得道而成圣成贤的过程。因此,中国传统政治被称为圣贤政治,一方面是圣贤人办政治;另一方面是通过政治把人引向成圣成贤之路。这就是“治道”的双重含义,即办政治必须顺应天道,而且从政本身也是求道、得道的过程。

“天人合一”:

得道之人的宇宙观

得道之人所达到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在《中庸》《周易》中被表述为“与天地参”“与天地合其德”,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明理学则表述为“民胞物与”。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对天人合一有深刻阐述,并引申出一体之仁:“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

圣人就是达到一体之仁境界的得道之人。在这种一体之仁观念的影响下,父与子、夫与妇、君与臣、兄与弟,乃至朋友、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在这种一体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仍然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而得以延续至今的文明。

按照“道”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行事的人即有德之人,有德之人治理国家天下就能够达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境界。正如《汉书·公孙弘传》记载:“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这就是顺天者昌、得道者多助的体现。遵行大道治理国家,就可以达到《礼记》中所记载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讲的是五帝的时候。“五帝”的一种讲法是指黄帝、颛顼、少昊、尧、舜。孔子祖述尧舜,最赞叹的就是尧舜的禅让制。尧帝的儿子丹朱和舜的儿子商均,德能都不足以治理天下。尧舜有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不把天下当成私家的来看待。尧舜把天下都可以禅让,其余还有哪一件事不可以让?这是真正大公无私的表现。尧舜能够把天下禅让,把天下当成是天下人共有的,才能实现选贤与能。

选举贤能之人出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兴办教育,而教育要把握根本,就是教人讲信修睦,其结果就是:“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礼记》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就是顺应一体的天道观办政治从而实现天下为公的治理境界。

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与天地合其德”,即圣王通达天人合一的道理,治理国家必须顺应“天道好生而恶杀”等天地自然的规律,按照一体之仁来治理国家、处理国际关系,自然能够化解冲突,消弭战争,达到国泰民安、天下为公的结果,这就是“顺天者昌”“得道者多助”。

“王天下”:

处理国际关系的文化传统

在“一体之仁”“天下为公”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自古以来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就倡导“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学》开篇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主能够率先垂范,以修身为本,百姓也能够效法修身,结果必然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当别国的使臣来访,自然生起羡慕效法之心,主动学习中国的礼乐文化,这就是“王天下”,即为天下人作出榜样示范。

从历史上看,“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商汤的地盘方圆七十里,但他能够成为天下诸侯国效仿的榜样。西伯昌(即周文王)所统辖的地区不过是百里之地,但他却使所有的诸侯国都臣服,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厚德。《史记》记载,虞、芮两国国君因为田畔产生争执而前来请周文王评判是非,当他们进入周的国境,看到全国上下和谐安宁,彼此谦让,于是不需要评判就回去了,还彼此互相推让田畔。天下人听说这件事后,归附周的有四十多个诸侯国。这是因为他们为周文王的厚德所折服,因而愿意主动向他学习以道德仁义为核心的文化。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之所以对邻邦乃至世界各国产生深远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人与人之间交往彬彬有礼,“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关系和谐,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把中国誉为“华夏之族”“礼义之邦”,而“中心悦而诚服”。历史上的中国在国力鼎盛之时,没有搞霸权主义。明朝郑和下西洋时,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每到一地,带给当地人民的是茶叶、丝绸、瓷器、先进的造纸术和造船术,而没有侵占别国一寸一尺的土地。中国现今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种仁义精神的延续。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系统研究了各个国家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未来属于中国》这本书中,他认为,要避免世界动乱、拯救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界必须走向统一,因此,建立大一统国家是必要的。但这个统一绝非依靠军事、强权的统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统一。特别是生物圈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法应对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视野去应对。而中国在历史上既有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华文化也以拥有天下一家的胸襟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所以汤因比把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上。儒家文化是讲求道德仁义的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所学习和接受,必能带给世界和平与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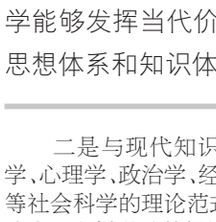
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更加凸显儒家思想中跨越时空的深邃治理智慧。《新语》云:“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道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懂得如何谋利却不明白大道的人,必然遭到众人的罢黜;敢于使用武力却缺少仁义的人,必定是战争攻伐的对象,最终逃不过灭亡的命运。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走的是人间正道,干的是正义事业,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违背时代潮流,不得人心、失道寡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国无德不兴。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处理国际关系,都要顺“道”而为。这也是理解中国之治和世界格局“东升西降”的文化密码。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

儒学社会科学化的价值与挑战

□ 察应坤



●核心观点:儒学社会科学化的核心目标是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冶炼,儒学能够发挥当代价值,儒家思想能够为当代所用,儒家思想系统性地融入现代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中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发挥主流和主导作用的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日用而不觉中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儒学经典和儒家思想的观念进行现代诠释,通过合理吸收和创新儒家思想智慧,拓展其应用领域,可以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儒学社会科学化这一命题由此也成了学界讨论热烈的领域。

核心目标

先来看什么是社会科学化?“社会科学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其核心含义是指“使某种事物具备社会科学的特征或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将某事物纳入社会科学范畴,让此事物成为研究对象——把原本不属于或较少被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现象、活动等纳入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是使某事物具备社会科学特质——某种实践、政策制定或思维方式开始系统地运用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如问卷或田野调查、实验、统计、定性分析)和规范。

“儒学社会科学化”是一个复合概念,一个理论框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儒学现代化转型或者说如何实现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社会科学化的核心目标是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冶炼,儒学能够发挥当代价值,儒家思想能够为当代所用,儒家思想系统性地融入现代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中去。正如著名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学典所言:“儒家思想的当代应用必须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冶炼。”

理论价值

儒学社会科学化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既包含认识论,也包含方法论。其理论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超越哲学阐释与道德说教,将儒学从纯粹的哲学思辨、伦理教条或个人修养的范畴,延伸到对社会现象进行系统性的、经验性的(或至少是可检验的)分析;

二是与现代知识体系接轨,利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儒学及其相关实践和社会影响;

三是提升解释力与实用性,在当代语境下检验儒家思想的解释力,探究其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的适应性、效用和局限性,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如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组织管理、伦理困境、文化认同等)提供基于证据的、可操作的方案或洞见;

四是实现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不是简单地将儒学“塞进”社会科学的框框,而是寻求两者的对话、融合与创新,既用社会科学激活儒家思想中的潜藏智慧,也用儒家思想丰富社会科学的视野和解释框架(如对秩序、关系、伦理、集体价值的重视),正所谓“社会科学研究者一旦走进儒家思想领域,除了将自身的预设和价值辐射进儒家思想领域外,反过来,它自身也必然会在学术形态上深受儒家思想的重塑”;

五是推动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挑战西方社会科学的主导话语,尝试建立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经验的社会理论,为世界社会科学贡献“中国视角”或“儒家视角”。特别是要破除韦伯基于欧洲中心视角提出的“儒家毫无逻辑创造”和列文森以二分法价值判断立场出发认定的“儒家是传统中国的象征与实质,当儒家从客观上的意义变成了在主观有意义时,即从普遍性的价值变成了一种特殊性的价值时,它已经结束了自身的使命,只具备历史的意义”这两种绝对主义说法。

在长时段和大视野下理解儒家思想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实际作用,那么“儒学社会科学化,实际上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学术与现实多维交织的过程,是东方与西方的思想观念交流与碰撞的过程,是儒学与社会科学在共同直面并为中国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时,互相成就的过程”。

非简单包装

儒学社会科学化不是简单把儒学包装成科学。有效地进行儒学社会科学化,需要学者在功力、见识和品格上的合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深度的跨学科合作,儒学学者与各领域社会科学家(以及可能的行为科学家、认知科学家)的有效对话和协同研究;“要有很强的风险洞察力、预见力,也就是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能力”;严谨的方法论训练,精通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能灵活、创造性地将其应用于儒学议题;对两者的“同情之理解”,既要精通儒家经典的文本和思想脉络,又要深刻理解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方法论体系和边界;批判性的反思精神,避免盲目信仰或简单否定,保持开放、批判和反思的态度,不断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相关的理论与方法。

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它无疑是儒学焕发新生机、深度参与构建现代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知识体系的一条重要途径。其结果可能不再是纯粹的“儒学”,也不是标准的“西方社会科学”,而是两者交融激荡所产生的、具有独特解释力和生命力的新知识形态。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引入传统儒学研究,将对儒学的思想史研究拓展为对儒家社会和儒家生活方式的研究,在社会科学视野下重新挖掘和阐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发展之间的深层联系。山东大学进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程”就是推进儒家思想社会科学化阐释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实践的积极布局。

诸多挑战

儒学社会科学化对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自身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儒学社会科学化”这一过程本身也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价值负载与客观性。儒学本身内含丰富的价值判断和规范诉求。将其社会科学化时,如何在追求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与尊重其固有的价值关怀之间取得平衡?如何避免使研究沦为儒家意识形态的辩护,或仅进行浅表化的概念移植?

二是概念的复杂性与普适性。儒家概念内涵丰富、历史演变复杂、情境依赖性强,将其精确操作化并保证跨情境可比较性存在巨大困难(如“仁”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含义)。

三是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儒家思想产生于农耕文明,其核心假设(如等级秩序、家族本位)与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平等、法治等主流价值观存在冲突。社会科学化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根本张力?

四是“科学化”本身的限度。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实证量化方法)在捕捉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生意义、终极关怀、精神境界等深刻面向时存在局限。如果片面或者过度强调“数据化”可能导致儒学的精神内核被简化或忽视。

总之,儒学社会科学化是儒学研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和必要路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它将突破传统儒学研究方法的局限,为理解儒家文化的复杂性、其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实际运作及其与现代社会诸领域的互动,提供新的、富有启发的视角、工具和空间。它使得儒家研究能够更有效地参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也更能回应现代社会变迁提出的实际问题。然而,这个过程并非简单的“替换”,而是一种互补性的拓展。

成功的社会科学化的儒学研究,必然需要建立在扎实的文本理解和历史洞察之上(仍需传统人文方法的根基),同时对使用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保持反思性(意识到其可能的局限和预设)。它需要在实证分析与人文理解、经验描述与价值关怀之间找到平衡点,最终目标是更丰富、更深刻、更具现实解释力和建设性的儒学理解以及推动儒家思想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运用。

它不能取代儒学的哲学探讨和价值弘扬,但可以为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和社会现实的检验,从更宏大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它为儒学研究和儒家思想更新拓展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空间。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

抓作风建设这根弦松不得

□ 齐萍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也将是长期和复杂的。作风建设作为政党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更显示出独特的时代价值与功能定位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必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作风建设,从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到印发实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始终把作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坚持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加强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和复杂的。作风建设作为政党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显示出独特的时代价值与功能定位。

作风建设是政党生命有机体的“免疫调节系统”。如同人体的免疫系统,政党肌体也需借助作风建设来构建强大的“政治免疫系统”。这个系统通过持续的思想淬炼来筑牢信仰之基,通过严格的制度约束来扎紧权力笼子,通过严肃的执纪问责来惩治害群之马,不断清除肌体组织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增强对各类“政治病毒”的抵抗力与自我修复力。新时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纠治“四风”,正是我们党主动净化肌体、增强免疫力、确保肌体健康的生动实践和伟大创举。

作风建设是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强大政治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最终需要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工作作风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治理效能。浮夸虚报、推诿塞责、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不良作风,对政令畅通构成了极大损害,导致党的政策意图在层层传导中出现偏差、衰减甚至异化,形成“中梗阻”或“末梢炎”。反之,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勇于创新的优良作风,则是政令畅通的有效保障,能够确保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脱贫攻坚战的显著成效表明,优良作风是我们党释放制度优势、激发治理活力、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催化剂。

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情感基石。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信任与拥护,不仅源于党的鲜明政治纲领和擘画的宏伟蓝图,更源于身边党员干部一言一行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孔繁森扎根雪域高原、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杨善洲退休后二十余年绿化荒山的坚韧执着,谷文昌“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铿锵誓言……无数具体可感、生动鲜活的人物典范,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党的优良作风,由此筑起牢不可摧的情感长城和精神认同。作风连着民心,小节关乎大义。优良作风是凝聚民心、巩固执政根基的力量源泉。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作风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与实践要求,不断深化认识、拓展内涵、创新方法。

深化“作风也是生产力”的实践认知。推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和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破除阻碍市场活力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力戒耗费基层干部精力的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事事建台账、过度留痕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赋能增效,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涵养创新生态、激发社会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作风建设成效体现到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的实际成果上,以作风之变促发展之进、增民生之惠。

强化“人民主体性”在作风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与制度保障。党的作风建设成效如何,最终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党的作风建设全过程,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创新群众参与方式,完善民意收集、分析、反馈、评价闭环机制,让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成为改进作风的“指挥棒”和“晴雨表”。要继续探索创新“电视问政”“网络评议”“基层观察点”“党风政风监督员”“码上评价”等平台载体,使之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确保群众监督更便捷、更有效,防止流于形式。

突出“数字赋能”与“制度固本”的双轮驱动与融合互促。面对“四风”问题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新特点,需借助现代数字手段,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对权力运行轨迹、公共资源交易、财政资金使用、民生项目落实等领域的动态监测分析,识别“四风”新动向、新马甲,严防快递送礼、电子红包、吃公函等新问题。同时,还要扎紧织密制度的笼子。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作风建设实效作为硬指标,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保护干事创业积极性。推动作风建设相关制度的高效协同,深化党务政务公开,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透明化,压缩不良作风的滋生空间。

加强作风建设,是百年大党一脉相承的精神标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不褪色的鲜明印记,更是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实保障。面对长期存在的考验和危险,必须把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常抓不懈,作为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的重要环节持续推进,不断擦亮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鲜明品格,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